

新现象学对海德格尔“在世存在”思想的扬弃

庞学铨 冯 芳

(浙江大学 哲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在新现象学奠基人施密茨看来,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生存论分析是刻画严格主体性的杰作,然而这种主体性却是被异化的。海德格尔尽管突破了内心世界假说,超越了胡塞尔的主体性,但由于忽略了身体在严格主体性中的基础地位,使在他那里已萌芽的情景存在论终至“扭曲”,错失了凭切身的“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奠立一种恰如其分的主体性学说的机遇。新现象学深入探究身体在“在世存在”中的意义,正式提出一种较为完备的情景存在论学说,并在(身体)情绪震颤的主观事实基础上提炼出新现象学视域下的“在世存在”即严格主体性。

[关键词] 新现象学; 严格主体性; 身体; 情景存在论

"Being-in-the-World" under the Horizon of the New Phenomenology

Pang Xuequan Feng F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Hermann Schmitz, founder of new phenomenology, regards Heidegger's existential analysis in *Sein und Zeit* as a masterpiece of strict subjectivity. However, this strict subjectivity there is alienated. Although Heidegger had broken through the "inner world" hypothesis and had thus transcended the subjectivity by Husserl, he overlooked the basis of the strict subjectivity—the "felt-body" (Leib) and eventually distorted the situation ontology in the embryonic stage. As a result, he missed the opportunity of establishing an appropriate subjectivity theory through literal "being-in-the-world" (in-der-Welt-sein). The new phenomenology probes in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elt-body" in "being-in-the-world" and proposes a more organized theory of situation ontology. On the basis of corporal-emotional fact (subjective fact), it also refines "being-in-the-world" under the horizon of the new phenomenology, namely the strict subjectivity.

Key words: new phenomenology; strict subjectivity; felt-body; situation ontology

海德格尔是公认的 20 世纪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其思想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受 20 世纪现象学首倡者胡塞尔的影响开始其“现象学之途”,在“批判后者的现象学认识

[收稿日期] 2010-01-19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0-09-09

[作者简介] 1. 庞学铨,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德国哲学研究; 2. 冯芳,女,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现象学研究。

论中心论中提出他的生存—存在论思想”^{[1]320}。这样的存在论的现象学是实际生活经验(faktische Lebenserfahrung)的现象学、生存(Existenz)现象学。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凭借‘Existenz’突破内在性教条,从而赢得一种实际生活经验的、更广阔的视野”^{[2]367}。人的实际生活经验正是新现象学的关注焦点。在新现象学奠基人施密茨看来,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模式已初具情景存在论的萌芽,但海氏的“在世存在却是没有身体”的,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活生生的”(lebhaft)。身体角度的缺失最终导致生存论分析后半部分的“扭曲”。施密茨不认同海德格尔对死亡的诠释学演绎,认为这是“脱离现实”的。新现象学立足于经验现实,深入实际生活,着重探讨身体在“在世存在”中的意义,正式提出一种较为完备的情景存在论学说,并在(身体)情绪震颤的主观事实基础上提炼出新现象学视域下的“在世存在”即严格主体性。

一、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

首先来看新现象学的生存论分析。施密茨基本上以异化为导向来观照《存在与时间》中的生存论分析。“《存在与时间》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历史处境。这本书被视为对严格主体性隐退型异化困境的一种解决方案。”^{[2]378}要说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用来指称人的 Dasein 是一种异化的主体性,有必要先了解新现象学的一些术语,包括“主观事实”、“严格的主体性”、“主体性的隐退型异化”和“投射型异化”。

最关键的区分在于“主观事实”和“客观事实”。客观事实是具备语言能力的人皆可言说的事实,而主观事实旁人却无从揣摩把握,亲身体会的当事人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强烈的情绪震颤往往“剥夺”人言说的能力。客观事实并非全部和唯一,主观事实较之客观事实,有着别样(甚至程度更高)的事实性。这是因为主体性作为以身体为基本轴心的原初当下(primitive Gegenwart)^①展开的五方面之一,较客观性更为“源出”,理论概念构筑的客观性却反客为主,将“事实”收归己有,导致主体性在现代思想中的异化。因此,提出“严格主体性”是要为主体性“正名”。它不是主客对立的、先验统摄的主体性,也不满足于“在一种客观事实系统中占据某种特殊地位,而是有权要求一种特殊的事实性或存在方式——情绪震颤的主观事实的事实性”^{[3]721}。施密茨通过研究得出,这种主观事实的严格意义上的主体性的发现可以追溯到费希特,然而,“认定一切事实皆客观的他将主体性(自我)放逐到了一切事实之彼岸的‘无人地带’(Niemandsländ),或任其在或依赖或独立于限制性的客观事实之间游离——如同一枚没有末端的螺钉”^{[3]721}。这也是现代主体性异化的开端。异化分为两种,这种被剥夺此岸“居留权”而导致的“主体性隐退型(ressessive)异化”与马克思意义上的“投射型(projektive)异化”相反,投射型异化以此岸的需求和机遇为目的,单向度地将主体性“制造成”客观力量,直至超出人的承受限度。

在施密茨看来,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围绕 Dasein 展开的演绎,便是对隐退型异化的一次出色的理论刻画。异化与否以“生活的自足”为尺度,海德格尔从前期强调无区别、不计较的自足的“实际生活经验”,到《存在与时间》中谈论实际生活必不可免的厄运(沉沦)和返归本真,这种语调的转换隐含海氏最终与严格主体性(其所谓“向来属我”)失之交臂。“在海德格尔倡导‘实际生活经验’的1919年冬,生活还无须超出自身,展开其‘返归本真’之旅,生存是被开启的情景、所经验意蕴的完整具体的统一;1921年冬‘生活的自足’则已为‘担忧分崩离析、为世界卷入’所取代。”^{[3]726}

事实上,这种转变在《存在与时间》的准备期已获得充分的展开。严格主体性显露于海氏1919至1920年冬所作的三个报告中。“年轻的海德格尔激烈地反驳胡塞尔和李凯尔特僵化的‘作为奠

① 关于新现象学之“源发生”(Ureignis),下文会作具体说明。

基的自我结构’、‘纯粹自我’；我们的实际生活便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不断以各种方式与其遭遇，被束缚、排斥、陶醉、反感，所谓‘认识到’（Kenntnisnahme）总是包含某种特定的意义。”^{[3]723}。用施密茨的话来说，实际生活经验（尤其是情绪震颤的主观事实）绝不是什么私人的内在性，而囊括一切以种种方式（如持赞同或否定的态度）与某人相关联的事物，“主体的”并不意味着类似“纯粹自我”的个别主体。这种情绪震颤的严格主体性指引着这一时期的海德格尔，他称之为“将主观事实中性化为纯粹实事性（Sachlichkeit）之前‘世内遭遇的情绪牵引’（affektive Weltbindung）”^{[3]724}。

1920年夏，海德格尔在反对实际生活的投射型异化时发现了与其相对的隐退型异化：倾慕（Geneigntheit）催迫生活向着世界，固着其上，而被世界卷入，那种使好感（Neigung）成为可能的距离消失不见。于是，将生活所展现之物收入囊中（投射型异化）的倾向消失了，由此产生一种匮乏感——实际生活中总缺少点什么，到底缺少什么，却又无从知晓……“我”不见容于“区域或实事领域”，任何区域化的规定（如意识流、体验之关联）都会损害“bin”（相当于“我思故我在”之“我在”）的意义，并将“我”制成一个可固定、可归类的客体^{[3]724}。施密茨对此评论道，这正是对严格主体性被逐出客观事实世界非常恰当的表达，客观事实既然是唯一的事实，主体性也就无事实内容可言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德格尔基本上没有超越费希特，毋宁说他深入了隐退型异化打开的广渺空间，令主体性“嬉游于虚空”。处于投射型和隐退型异化之间的严格主体性还可见于1922年的“那托普手稿”：“牵挂之变动不定”（Sorgensbewegtheit）便是生活陷落（Abfallen）的基本倾向，即向着世界的沉沦（Verfallen）和自身的瓦解（Zerfall）。这种倾向是实际生活最根本的厄运。Dasein的存在本身，也即“生存”，只有在反抗或拒绝沉沦中才能获得。在建构存在的意义上，否定优先于地位——相当于舍勒所说“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之“地位”。这种否定即死亡，死亡的触手可及使生活本身显露出来。从死亡而来即向死而生才使沉沦于世间的生活获得解放^{[3]724}。

原本“自足的生活”（实际生活经验）何以“陷落”（沉沦世间）？这两者间有怎样的关联？此裂痕又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问题海德格尔当时尚无法解答。到了《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才交出另一份答卷。他借经验哲学关于 *essentia*（*was es ist*，即“所是的东西”，一般译为“本质”）与 *existentia*（*dass es ist*，“它即是”，一般译为“生存”或“存在”）间的“真实差别”（*real Verschiedenheit*）来解释这种现象，通过生存论分析，又从根本上推进了这种区分。施密茨认为，对提出这种区分的托马斯主义者来说，*essentia* 与 *existentia* 尽管真实地相区别，但同时又不可分割地共属一体。海德格尔则凭借 *Dasein* “撑裂”（*zerdehnen*）了这种关联——*essentia* 脱离 *existentia*，“伸展”为纯粹的可能性。*Dasein* 更是其可能性，它“拥有”可能性不仅仅是在现成之物（*Vorhandenes*）意义上的。纯粹“它即是”意义上的 *Dasein* 退居“幕后”，其何所来、何所去则隐蔽不彰。这种“它即是”便是海德格尔所谓的“被抛（入 *Da*）”，人与其谜一般严峻的 *Da* 面面相觑^{[3]728}。这实即出离“自足的生活”的人面对自身投射型异化的困惑，世内的因缘（*Bewandnis*）失去意义，被“釜底抽薪”的 *Dasein* 赤裸裸地在虚无的世界中惶惶不可终日；现实给予的“如此这般的存在”（*Sosein*）不能令它满足，反倒是负累——它不得不成为的存在，于是明明白白的“它即是”成了“它是它不得不是的”，它被抛入“被托付的实际性”^{[3]728}。投射型和隐退型异化本是双生子。

施密茨认为，相比“那托普手稿”，《存在与时间》中的 *Dasein* 结构（赤裸裸的 *existentia* 及伸展为纯粹可能性的 *essentia*）带来两方面的效应：隐退型异化的严格主体性能通过这样一种模式获得精确的表达；由这种模式得出沉沦之不可避免。

这首先推进了对于我们所是的存在者的理解。我们所是的存在者的本质不能凭借“实事领域”获得规定，这种本质更确切地说在于“它更是将存在作为（属于）它的去存在”（*es je sein Sein als seiniges zu sein hat*）；“因而我们赋予这一存在者的称号 *Dasein* 并没有说明它是‘什么’（如桌子、房子、树木），而指其存在。这种存在不是实事领域的‘什么’，因为它作为可能性总归还不‘是’，由此

有力地证明了‘我’的特殊性——不见容于区域、实事领域”^{[3]729}。Dasein 首先是与其他存在者(包括同类 Dasein——他人)共同“在世”,实事领域的“什么”是从出的规定性。Dasein 被托付了存在,Dasein 要自身去存在。情绪震颤的主观事实正是 Dasein“在世”的遭际。这一点上,新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立场相近。

其次,海德格尔表明沉沦不可避免的根源便是操控着 Dasein 的存在者的“不确定性”(Unbestimmtheit)。essential 被扩展为暧昧不清的可能性,与主题式的把握不相容。这样的把握恰恰剥夺了对象的可能性特征,将它“降格”为被给予的(gegeben)、被指定的(gemeinten)事物。Dasein 的存在成分(Seinsbestand)原本无从确定,尽管被托付了种种可能性,但它们并非唾手可得。Dasein 为找到它的可能性,需要更明确的存在者的支持,由后者来向它展示它的可能性。因而为了存在,Dasein 又将自身交托给(其他)存在者。理解 Dasein 的存在就意味着“首先从 Dasein 本身不是、而是它在自身世界中遇到的(其他)存在者及其存在方面来理解”。“世界是意蕴之整体,‘牵念’(Besorgen)事先就牢牢固定在其指示性的关联网中。”^{[3]731} 这种“依附”又是一把双刃剑:“尘网”指示 Dasein 种种关联,由此主题式地发掘出 Dasein 的可能性;这种意义上的世界是以因缘方式让存在者交会的所在,为 Dasein 指出其自身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是 Dasein 需要背负的,它不得不成为它的可能性。如此将自身固定下来,Dasein 便能够“在世界之中”洞察自身。然而,这却是“俯身”世界(Geneigtheit, an seine Welt)、沉沦并返照式地从世界方面来把握自身——Dasein 为了找到自身,要凭借这些存在者的指引关联,后者给予它固定的主题、角色,由此也使可能性僵化为主题式把握的对象。“存在者层次上,Dasein 错看了其自身所是的存在者的存在样式。”^{[3]729-730} 在施密茨看来,对这种“不确定”的追究和发挥恰恰肇始于严格主体性的隐退型异化,是人脱离了“自足的生活”(实际生活经验)的“果报”。

总体而言,施密茨将生存论分析看做是海德格尔对一直以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隐退型异化的严格主体性第一次概念化表达的成功尝试,它在知识界与大众中取得广泛成功便是明证。生存论分析的巨大成果是通过“在世存在”模式的提出克服了内在性教条,从而推进了迄今为止的“地位”主体性(笛卡儿、康德、胡塞尔)。但海德格尔还是没有完全摆脱内心世界一外在世界这种两极对立模式的教条,他对传统人类学“肉体—灵魂—精神”模式既表达了半信半疑的认同^①,又揭露出依附于世界的 Dasein 在“被抛”中并没有强大到足以构筑起一个稳固的内心世界的程度。施密茨认为,在严格的主体性尚未发生异化前(1919—1920),海德格尔原本能跨越这种暧昧处境。海德格尔没有认识到,Dasein 所在的世界是一个能够将状况型个人情景(die zuständige persönliche Situation)^②容纳于自身的共同的世界。他却将世界神秘化,称之为因缘际会(Begegnenlassen über das begegnende Seiende)的先天视域,这原不过是“公共的‘我们的世界’或自身世界(包括最切近的周围世界)”^{[3]735-736}。

“在世存在”模式是海德格尔思想中最具启发性之处,他强调世内的存在者首要地依赖于将世界整个囊括其中的意蕴的指引关联,现成在手的个别(事物)是派生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海德格尔为新现象学情景存在论的提出作了准备,但对状况型个人情景融入共同情景所必需的意蕴内在发散的混沌多样的特性,他似乎只是片面渲染了其消极性(“众生态”好奇、闲言、两可),缺乏正面评价。

生存论分析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说明 Dasein 究竟如何“遭遇”指引其可能性的(其他)存在者。

① 1925 年夏季学期的讲课中,海德格尔这样表述此在:身体、灵魂、精神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此在,然而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这种复合及其组成)从一开始就是不确定的。十年后海德格尔在《哲学论文集(关于本有 Ereignis)》中又称:说人由身体、灵魂、精神组成,并没有切中问题,对整体存在的追问被绕了过去。参见 H. Schmitz, *Der Weg der europäischen Philosophie*, Freiburg/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2007, p. 735。

② 新现象学用个人情景取代了所谓心灵、灵魂的概念,下文会有进一步说明。

尽管其指引关联中的工具的上手概念历来为人津津乐道,但单凭“在决定世界结构的意蕴关联中‘绽开地’理解自身及其世界”,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吗?器具是被用熟的,关键还在于海德格尔忽略了作为生活世界基础的身体要素,这正是新现象学深入开辟的“新”领域。

二、新现象学以身体为基础的“在世存在”

情绪震颤的主观事实即严格主体性以身体为基础。身体是人能在肉体部位感觉到却又不局限于皮肤边界的一方特殊“领域”。西方哲学传统中,身体因素历来被忽略甚至鄙弃。Ute Gahlings 在《现象学中身体的重新发现》一文中说道:在欧洲哲学形而上学的主流传统中,人类的身体(Leib)通常被与(物质性的)肉体(Körper)相提并论,被视为易逝的、不完善的、为种种欲念驱使且反叛的灵魂之尘世的外衣,需要被驯化而没有独立性。近代笛卡儿肉体与灵魂的两分尽管赋予肉体独立的实体地位,但也正是他对人的物质性(即肉体)的强调(宣扬对肉体的科学理解在拉美特利那里甚至发展到了机器譬喻),使“人(在肉体部位)感觉到的身体”长期被排除在正统的哲学视野之外^{[4]36}。

新现象学明确区分肉体 and 身体,并强调身体的独立意义,它“是人与一切令他/她触动的事物遭遇的场地,在这里它们激起他/她回应性的组织能力”,是“一切知觉和所有社会行为的必要条件和形式前提”^{[2]365}。身体动力学和身体交流才将意蕴之指引关联与我们遭遇的(其他)存在者联系起来。原始人使用的投石器是怎样被找到的?海德格尔没有说。

前面已经提到,施密茨在海氏“在世存在”模式即意蕴之指引关联中看到了一种情景存在论的萌芽。正是身体的“重新发现”,才使意蕴的指引关联能够获得具体和最为鲜明的说明,新现象学正式提出情景存在论才算水到渠成。施密茨说,人们通常在没有刻意进行自身调整的状况下知觉到的便是情景(Situation)。他归纳出情景的三个主要特征:首先是整体性,即内在关联;其次,它凭借意蕴(即事态、程序、问题)内在关联;最后,意蕴是内部发散的,即并非其中的一切(元素)都是个别(量化个别的)。2009年出版的《新现象学导论》中,施密茨明确提出,身体动力学和身体交流是情景最重要的源泉:情景包括一切动态能力(motorische kompetenz)及其实现,如咀嚼、言说、抵御危险。所有这些情况都涉及(事态的)领会、(程序的)调准和(问题的)克服。以司机雨天危急关头避过险情为例,他/她是一下子在对抗性的入身(in antagonistischer Einleibung)^①中明了相关状况并作出回应的。这样的情况下,情景完整的意蕴整个显现出来,这就是印象型情景(impressive Situation)。相反,意蕴分阶段显露的则是分割型情景(segmentierte Situation)。情景的另一大区分是当前型情景(aktuelle Situation)和累积状况型情景(zuständige Situation),前者指在较短时间内便能体察其变化状况的情景,后者则需要较长的时间才可能对此作出判定。一切动态能力皆为累积状况型情景,其实现则为当前型情景。当人以对抗性或共同的入身与其他身体性存在(人或动物)发生关联,这种当前型情景的意蕴便尤为丰富。拥有意识者之间的这种包含入身的情景中,饱含掌控和臣服的微妙转换,这在眼神交流的状况中尤为显著^{[5]47-48}。

原初当下和当下展开乃至“成为”遍布个别之物的世界(通常理解的客观世界)便以这样的情景为分界。原初当下是新现象学体系的“源发生”,一切皆源于“此”,维系于“此”,最终也将复归于“此”。原初当下在这样一些状况下“演示”(或曰“显露”)自身:夜晚从睡梦中忽然醒来,心惊胆战;惬意的小憩被尖锐的声响“割裂”;脑袋意外地中了一击;忽然记起几乎错过的重要约会,惶急如热锅上的蚂蚁——经历的“持续状态”似乎被撕裂了,有些说不清的东西在锋利的尖端上,令他/她备

① 指“我”的身体与外界“接通”,参见庞学铨《身体性理论——新现象学解决心身关系的新尝试》,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6期,第5-13页。

受折磨,不知所措。他/她本人连同周围世界被抹去,只剩下一些确凿(eindeutig)却又缺乏规定性的东西,一个“此”,无可回避,然而也仅仅如“此”,无从归类。

这个“此”蕴含五个维度。首先是时间,从混沌的持续中“撕扯”出来的一种已包含结构的时间性。处于锋利的尖端上的是“遭遇之物”(etwas Widerfahrendes),犹如入侵者,从“持续”中敲击出作为“当下”的这一刻,“持续”由此被撕裂,沉入过去的“不再存在”。这种结构的三要素尚缺乏规定性:入侵者还没有呈现出这种或那种面貌,撕扯出的“当下”还没有定向,而过去的“持续”无区别地坠入迷蒙。尽管如此,情态时间(Modalzeit)的三个截面,即“过去”、“当下”、“将来”已初露端倪。无规定性的入侵者,恰如原本意义上的将来(Zukunft)——“向……而来”(Zukunft),这一还没有开展出规定性的新事物凭借其强力从“持续”中撕扯出“当下”,将它暴露出来。这一“将来”和“当下”间不存在分裂,犹如打造在一起的共现(Appräsens);另一方面,此事件同时导致“告别(过去)”,“共现”的“当下”捣碎了平滑的“持续”,它滑入“过去”。这样一种原始形态的“情态时间”是“纯粹情态时间”。这是因为它尽管包含“存在者”和“不再存在者”的情态区分,但尚未构成“先、后或者同时”的层次结构,即非“过去”、“当下”、“将来”的三阶结构,而是“将来”、“当下”所组成的“共现”与无区别地滑落的“过去”相对的二阶结构。其次,从“存在”方面来说,“当下”的“存在”相对于过去的“不再存在”清晰地凸显出来,这便是“现实”经验的源泉。此外,还有“主体性”方面和空间方面。“存在”与“主体性”交融,即“感觉到自身的震颤”(das Sichspüren als betroffen),由此而知这与“我”本人有关(但这个“本人”尚不是拥有规定性的个别主体)。而在身体上,感觉到一种收缩,它联结狭窄(Enge)与宽广(Weite),收缩的身体源出于“宽广”,挤入或被逼入“狭窄”。最为特别的却是缺乏规定性的“确凿”。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情况下,确定性(Eindeutigkeit)必得依赖规定性(Bestimmtheit);“规定性”意味着“某某作为某某之一种”(etwas als ein Fall von etwas),也即某个属(Gattung)的一个种,某某是凭借具备一种特点或处于一种关系之中才获得其确定性的。但如此一来,“确定”也就名不副实了,它仅仅是间接的“确定”,为次要之物重重包围,由它们决定它之作为“个别的这一个”(dieses einzelne Eine)。以上所描述的经验中涉及的却是直接的“确定”,这种“确定”及其缠磨人的效力来自被逼入“狭窄”,而非作为某某属之一种的规定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此”尽管包含了时间、空间、存在、主体性和确定性(同一)五个维度,却尚是“单层的”(einfach),因为这五个维度都融于一个原一此(Ur-dieses)——某物不是作为某属的一个种,而是仅仅如“此”,五个维度尚未(依各自进路)分道扬镳,纯粹作为它们本身,恰好相合于“此”。这种绝对纯粹的状态便是“原初当下”——时间维度的“当下”、“存在”、“主体性”、空间位置以及“同一”的源泉。

原初当下的生活层面是纯粹的情景界,其意蕴还是完整的,没有个别的意义从中被“解析”出来。如上面提到的司机雨天避险的例子中,高度的身体智慧就得以展现。句子形式的言谈的出现是对这一层面的跨越,这种能力也是人相对于动物的优势所在——人能按其意愿从情景中“个别地”提取出事态、程序、问题,构成布局(Konstellation),从而掌握局势(Lage)。这种对意义进行的个别析取才造成了任意事物(Sachen)的个别性。也就是说,情景的完整根本上先于个别性或数量的一(单一事物和特性)。个别从情景中“跃出”之后,才有世界之作为遍布个别之物的场地。“在世存在”的人注定要对情景进行重组架构,这是生存所需。但不断从中汲取“养分”的人们必须承认并尊重其内在发散的完整意蕴。不能忘记,此世界的“原生态”和基础还是情景界。不是一往无前的进步,而是在回返(源头)和前进的不断交替中,生命才得以成长、累积。“在世存在”于是意味着——在原初当下和展开的当下撑起的活动空间中“浮—沉”、“进—退”。

情景是这片广阔地带的“活水源泉”。人赖其为生,而人本身也是一种情景,一种庞杂繁复的累积状况型情景,即个人情景(persönliche Situation),新现象学提出它以取代灵魂概念。原初当下的展开对人来说意味着成长,这一进程大概在八个月大的婴儿那里就开始了^{[6]72}。意蕴被客观化,“剥落的”

主体性“分得一块划定的领地”，这块领地的出现便是个人情景的萌芽。不似灵魂之为私人经历的封闭处所，个人情景“下通”前个人层面的原初当下（情绪震颤向着原初当下），又能“植入”跨个人的共同情景并容纳无数局部性情景，此过程大致可划分为回顾（记忆晶核）、当前（立场、脾气、生活技巧、养成的兴趣等）、展望（种种愿望、惧怕的“图景”）三部分。通常所谓的个性（Personalität）是狭义的个人情景（强调个人品性），完整意义上的个人情景还包括身体素质（leibliche Disposition），后者承载前者并能对前者施加影响。施密茨又将此两者比喻为个人情景的“高音部”和“低音部”。“低音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稳固的，很少受到“高音部”的影响，却能在根本上左右“高音部”（事态）的风格^{[7]110}。个人情景并非个体与外界隔绝的“私事”，它是从人一开始就“嵌入”的共同情景（尤其是出生背景、家庭的价值伦理、城市、民族的风俗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后者给予其支撑和深度；人也能“植入”这类共同情景，特别是恋爱、婚姻关系中自发形成的情况。人们生活于其中、切身相关的周围环境正如各种情景汇编而成的织毯，个人情景原本就是这织物的一部分^{[8]75-76}。这无数情景或流畅或严实地包围着个人情景，有些如同已将它“栽入”自身之中，有些则仅是些条条框框（如所谓的社会行为模式），无视它们并不难^{[2]95}。身体交流不断促成新的当前情景（如对话），它们又“嵌在”种种累积状况型情景（印象型和分割型）中。以这种方式，个人情景一生都能“长入”共同情景。

这样以身体为基础的“在世存在”便是新现象学眼中严格的主体性。它为困扰现代西方的异化问题指出了一条有别于海德格尔终极指向的“凡俗”之路。“被抛”的海德格尔在 Angst（“焦虑”，一般译为“畏”）中有了朝向本真的能存在的一跃。新现象学没有“内在的超越”这一层，它在自身转向（Selbstzuwendung）中“获得自身”。“获得自身”对施密茨而言即自身确认，所能依凭的还是身体。对羞耻感的分析可以使我们对这种“自身转向”有一个初步认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新现象学所说的情感并非是私人内心的灵魂状态，而是类似于天气、在空间中扩散开来而能作用于身体的强力。羞耻感便是这样具有“权威”的典型情感。人被强烈的羞耻感侵袭之际，并非是自身以高人一等的法官之姿对自己下判决，而是在情感的权威前屈服或自惭形秽。他/她不得不承认，其行为方式或处境折损了自身的骄傲。被迫默许一种对自身不利的判决，这是情感穿透性地作用于身体的力量对他/她的苛责。感到羞耻的人本身屈服于对他/她的归类，这种“认同”（默许对自身不利的判决）并非对一个“判断”或“事实”的认同，而是一种导致后果的自身转向。正是羞愧者被迫“自身转向”，才使对其不利的判决获得那种情感上的强制力量^{[7]68}。

再以 Angst 为例。海德格尔极力渲染 Angst 之为一种非对象性的基本处身情态，同时更是通向本真的关键。而在施密茨看来，Angst 根本上还是身体的^①，是紧张与放松的生机驱动（机制）中紧张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9]11}，并且这是一种相对宽松、节奏性交替的联结形式（区别于如疼痛之紧凑）。从词源上来看，Angst 属 eng 词族，eng 的基本义便是（被驱入）狭窄、收拢。多数情况下，Angst 能与侵袭人的情感氛围产生共鸣。尤其是 Bangnis（惊恐、恐惧），这是一种威胁性的、可怖的氛围，散漫地向人袭来^{[2]215}。人可能在具体的危险（黑夜、密林、浓雾）中，也可能在没有具体危险可言的情况下（如周日的寂静、黄昏的阴寒、电闪雷鸣前天空变色）与之遭遇。当 Bangnis“搭接”身体性的 Angst，模糊的对可怖之物的预感便与 Angst 寻求突破阻碍却终将功亏一篑的冲动齐头并进，孕育出一种“雌雄同体”的由隔绝的“孤点”（寻求突破的冲动所向之终极）与氛围性的流离构成的鲜明反差。所谓对侵袭人的情感（Gefühl）的感觉（Fühlen），总是身体上感受到的（情感）共鸣，主要在于生机驱动（机制）“同步”侵袭身体的强力。如此恢复了 Angst 之身体本色，相应于具体情境，Angst 便可区分多种类型。除了对 Bangnis 模糊可怕的预感，面临具体险情的怕（Furcht）也能挑动 Angst，此外还有空间性的 Angst、对罪责的 Angst 以及 Ichangst。

① 一般存在哲学家喜欢说的 Angst，施密茨称为 Ichangst（成为我的“焦虑”）。

西方现代主体性的异化便是这最后一种形态的 Angst。在施密茨看来,包括海德格尔的隐退型主体性在内的异化根本上源于这样一种虚幻:事实领域为客观性吞噬,人切身的主体性却反而只能与虚无调情。Angst 并不神秘,新现象学身体性的 Angst 作为能与情感氛围产生共鸣的良好“触媒”,还是因为向着身体之绝对地点的原初当下(因而能提供一种自身确认,引发可能的自身转向)而对人有意义。通过身体与(作为氛围的)情感,海氏所谓之处身情态获得了进一步的廓清,能牵连囊括此种氛围情感以及事物的个人情景的提出,也使人生在世的基本情绪(如悲伤、羞耻)与人的关系能够获得进一步的规定和说明。

如此以身体为基础的“在世存在”在何种意义上推进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呢?我们已经看到,施密茨对海德格尔生存论分析的解读基本上以西方主体性的异化问题为导向。在恢复身体的基础意义的前提下,承认以身体为基础的主观事实具有独立于(甚至高于)客观事实的地位,这可以帮助我们梳理出一种恰如其分的主体性概念,而不致陷入自我异化而难以自拔。在施密茨看来,海德格尔基本上还是没有超出费希特,不能恰当地评价情绪震颤的主观事实。并不否定客观事实是唯一的事实形式,这正是海德格尔无法逃脱异化命运的根由。在施密茨看来,海德格尔后期对语言本性的探究以及诗化哲学的倾向流于神秘。新现象学正式提出情景存在论,并以此取代传统认识论中心的实体—偶性—关联之存在论模式。比起绕开主体(性)谈论形而上学的克服的海德格尔,施密茨代表了一种更为一贯地面向现实生活的态度。

贯通个人自身生活及其所处周围环境的情景不受僵死的对象化思维所“拘禁”^{[8]75},新现象学以这样的情景作为存在论基石,推进了长久以来受心物二元论困扰的西方哲学界对人自身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克服了受到指责的传统本体论纲要的片面性”,这在西方哲学史上是具有创新意义的^①。

[参 考 文 献]

- [1] 靳希平、吴增定:《十九世纪德国非主流哲学——现象学史前史札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Jin Xiping & Wu Zengding, *Non-mainstream German Philosophy in the 19th Century: Notes on Prehistory of Phenomenolog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2] H. Schmitz, *Was ist Neue Phänomenologie*, Rostock: Ingo Koch Verlag, 2003.
- [3] H. Schmitz, *Der Weg der europäischen Philosophie*, Freiburg/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2007.
- [4] U. Gahlings, "Die Wiederentdeckung des Leibes in der Phänomenologie," *Information Philosophie*, No. 2 (2008), pp. 36 - 43.
- [5] H. Schmitz, *Kurze Einführung in die Neue Phänomenologie*, Freiburg/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2009.
- [6] H. Schmitz, *Die Liebe*, Bonn: Bouvier Verlag, 1993.
- [7] H. Schmitz, *Spielraum der Gegenwart*, Bonn: Bouvier Verlag, 1999.
- [8] H. Schmitz, *Der unerschöpfliche Gegenstand*, Bonn: Bouvier Verlag, 1990.
- [9] 庞学铨:《身体性理论——新现象学解决心身关系的新尝试》,《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第5-13页。[Pang Xuequan, "Embodiment Theory: New Attempts of Neo-phenomenalists at Dealing with the Body-and-Mind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6 (2001), pp. 5 - 13.]

① 参见庞学铨《一种特殊的哲学对象理论》结论部分,载倪梁康等编《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四辑:现象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295页。